

中國佛教典籍選刊

[唐]道宣撰 郭紹林點校

續高僧傳

上

中華書局

中國佛教典籍選刊

續高僧傳 上

〔唐〕道宣
郭紹林

點校 撰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續高僧傳/(唐)道宣撰;郭紹林點校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4.9

(中國佛教典籍選刊)

ISBN 978 - 7 - 101 - 10307 - 6

I. 繢… II. ①道… ②郭… III. 僧侶－列傳－中國
- 南朝時代～唐代 IV. B949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154758 號

責任編輯：朱立峰

中國佛教典籍選刊

續高僧傳

(全三冊)

〔唐〕道宣撰

郭紹林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 · 45 印張 · 6 插頁 · 900 千字

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 - 4000 冊 定價:148.00 元

ISBN 978 - 7 - 101 - 10307 - 6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編輯緣起

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，約自東漢明帝時開始傳入中國，但在當時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。到魏晉南北朝時期，佛教和玄學結合起來，有了廣泛而深入的傳播。隋唐時期，中國佛教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，形成了衆多的宗派，在社會、政治、文化等許多方面特別是哲學思想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。這時佛教已經中國化，完全具備了中國自己的特點。而且，隨着印度佛教的衰落，中國成了當時世界佛教的中心。宋以後，隨着理學的興起，佛教被宣布為異端而逐漸走向衰微。但是，佛教的部分理論同時也被理學所吸收，構成了理學思想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。直到近代，佛教的思想影響還在某些著名思想家的身上時有表現。總之，研究中國歷史和哲學史，特別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哲學史，佛教是一項重要內容。佛學作為一種宗教哲學，在人類的理論思維的歷史上留下了豐富的經驗教訓。因此，應當重視佛學的研究。

佛教典籍有其獨特的術語概念以及細密繁瑣的思辨邏輯，研讀時要克服一些特殊的困難，不少人視爲畏途。解放以後，由於國家出版社基本上沒有開展佛教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，因此，對於系統地開展佛學研究來說，急需解決基本資料缺乏的問題。目前對佛學有較深研究的專家、學者，不少人年事已

高，如果不抓緊組織他們整理和注釋佛教典籍，將來再開展這項工作就會遇到更多困難，也不利於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成長。為此，我們在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，初步擬訂了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的整理出版計劃。其中，有重要的佛教史籍，有中國佛教幾個主要宗派（天台宗、三論宗、唯識宗、華嚴宗、禪宗）的代表性著作，也有少數與中國佛學淵源關係較深的佛教譯籍。所有項目都要選擇較好的版本作為底本，經過校勘和標點，整理出一個便於研讀的定本。對於其中的佛教哲學著作，還要在此基礎上，充分吸取現有研究成果，寫出深入淺出、簡明扼要的注釋來。

由於整理注釋中國佛教典籍困難較多，我們又缺乏經驗，因此，懇切希望能夠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協助，使這項工作得以順利完成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一九八二年六月

前 言

續高僧傳是初唐僧人道宣編撰的一部僧人傳記，因為續續蕭梁僧人慧皎的高僧傳，故名續高僧傳，又因為成書於唐代，也被稱作唐高僧傳。

道宣俗姓錢，一說吳興（今浙江湖州）人，一說丹徒（今江蘇鎮江市丹徒區）人，隋文帝開皇十六年（五九六）出生，唐高宗乾封二年（六六七）圓寂。道宣住世一共七十二年，多半時間是在隋唐兩代的首都長安（今陝西西安市）及其周邊關中地區度過的。隋煬帝大業六年（六一〇），他十五歲，在長安依止日嚴寺慧頤律師受業，次年剃髮，成為沙彌。年滿二十歲，他在長安大禪定寺依智首律師受具足戒，成為比丘，隨智首學習律學。唐高祖武德七年（六二四），日嚴寺廢毀，道宣隨慧頤駐錫於長安崇義寺，隨即前往終南山白泉寺修習定慧。唐太宗貞觀四年（六三〇）以來，他離開關中地區，遊方到今河南、山西、四川等地，廣泛訪學問道，巡禮勝跡。貞觀十六年，他入住終南山豐德寺，三年後受朝廷徵召，在長安弘福寺玄奘譯場擔任綴文大德，參與佛典翻譯。次年返還豐德寺從事著述。唐高宗顯慶三年（六五七），他被朝廷任命為長安西明寺上座，玄奘的譯場移到這裏，他再度參與譯經。道宣廣泛研究佛學和佛教歷史、地理，特別對於四分律的研究、理解和弘揚有突出的建樹，創立了佛教宗派南山宗。這一時期的律宗派別，還有相州（今河南安陽市）日光寺僧人法礪創立的相部宗，駐錫於長安西太原寺東塔的

僧人懷素創立的東塔宗，南山宗與它們並稱爲律宗三家，彼此有一些理論分歧。其中南山宗是主流派別，蔚爲大觀，後來律宗也就專指南山宗而言了。道宣一生筆耕不輟，著述豐贍，在隋唐僧人中堪稱翹楚。他的著作除了這部續高僧傳以外，還有律學著作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十二卷、四分律拾毗尼義鈔六卷、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一卷及疏二卷、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一卷及疏三卷、比丘尼鈔六卷，以及史地、目錄等著作釋迦方志二卷、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、大唐內典錄十卷、廣弘明集三十卷、集神州三寶感通錄（一名東夏三寶感通記）三卷、釋迦氏譜（一名釋迦略譜）一卷等。

道宣編撰續高僧傳，出於兩方面的考慮。慧皎撰寫高僧傳，對於在世的僧人不予立傳，紀事截至梁武帝天監十八年（五一九）。此後經過一個世紀，道宣才活躍於佛教領域。這一期間，南方經歷了梁、陳朝代的嬗替，北方經歷了北魏、北周、北齊、隋朝的次第統治和分分合合，隋唐時期結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。時世推移，風雲際會，佛教有了長足的發展，也遇到了艱難窘迫。高僧層出不窮，傳燈不絕，事蹟交相輝映。一些僧人資料，不斷浮出水面。一方面，高僧傳立傳僧人之後年代的僧人，佛教界有必要爲他們立傳修書，而且已經有可能立傳修書。另一方面，高僧傳成書於南北分裂阻隔時期，慧皎囿於當時的歷史條件，對於南方政權範圍內的僧人，容易搜集資料，敷藻載述，而對於北方政權範圍內的僧人，則難免疏於聞知，致使多有遺珠之憾。道宣生當八紘同軌、車書一統的環境，有條件對高僧傳的闕如進行一番補苴罅漏的修復工作。因此，道宣在少年時代便立下了撰寫續高僧傳的志願，命筆成編告一段落，又用了二十度春秋陸續增補，寫出的補充文字，開元釋教錄卷八稱之爲後續高僧傳，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

三稱之爲後集續高僧傳，直到他逝世前兩年才最終殺青。可以說，這部著作注入了他畢生的心血，耗費了他畢生的精力。爲了完成這部著作，數十年間，道宣在研究律學、參與譯事以及撰寫其它著作之餘，奔走東南西北，訪詢華夷僧俗，實地考察，瞻仰遺跡，搜集文獻資料，採擷碑碣銘文，終於集腋成裘，匯爲完帙。

貞觀十九年（六四五），道宣五十歲，經過多年的撰寫，以爲這部書可以綰一個疙瘩了，就爲它寫了一篇總結性的序，其中說：「始垂梁之初運，終唐貞觀十有九年，一百四十四載，包括岳瀆，歷訪華夷，正傳三百三十一人，附見一百六十人。」這裏正傳人數，是宋元磧砂大藏經本文的數據，高麗大藏經本文作「三百四十人」。這是階段性成果，即筆者上面說的「命筆成編」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可以叫做「初編」。

傳世的續高僧傳，有一些僧人傳記記載了初編截至時間以後的事蹟。如本書卷二一記載，法顯於「永徽三年（六五二）十二月八日……因覺漸疾，至四年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」；玄爽「以永徽三年十月九日遷神山谷」；惠普「以顯慶三年（六五八）終於本寺」；卷二三記載曇光事蹟，說：「今麟德二年（六五五），東都講說。」這類例證還有一些，茲不贅舉。這些傳記，都屬於道宣補寫的後續高僧傳的成分。本書篇幅最長的傳記是卷四玄奘傳，洋洋灑灑兩萬字。而玄奘西行求法近二十年，從西域回國，恰在道宣完成本書初編的年份。玄奘是麟德元年圓寂的，比道宣圓寂早三年。在這份傳記中，道宣詳細記載了玄奘回國後歷年的活動，都是自己目睹耳聞的事。但這份傳記也有後人補入的文字。蘇晉仁先生指出：「玄奘傳說：『其塋與兄捷公相近，苔然白塔，近燭帝城。尋下別敕，令改葬於樊川。』玄奘改葬是總

章二年（六六九）事，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，這時道宣已逝世二年，此語自是後人所補。開元釋教錄卷八玄奘的事蹟，就是引用本傳的文字，作「至總章元年四月八日，有敕改葬樊川北原」。可見補入的年代是相當早的。^{〔二〕}這是目前能夠確認的後人補入的文字。

有一則說法需要辨析，這不僅涉及對續高僧傳的閱讀和理解的問題，還涉及續高僧傳的著作權程度以及可信程度問題。日本學者藤善真澄教授發表續高僧傳管見——以興聖寺本為中心一文，宣稱從續高僧傳中又找到一則後人添加的文字。他說：

「皇儲久餐德素，乃以貞觀十三年集諸官宦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，延淨開闡法華。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，高宗下令遣與抗論。」（續高僧傳卷三慧淨傳）皇儲無疑就是後來的高宗。但是，使用「高宗」廟號，則是在道宣死去十五年後的文明元年（六八四）。顯而易見，文中的「高宗」或是「太宗」之訛，或是後人添加上去的。^{〔三〕}

這個說法需要分析。首先，貞觀十三年，皇儲是李承乾，唐高宗時為晉王，四年後才立為太子。「皇儲」無疑就是後來的高宗^{〔二〕}云云，顯然說不過去。其次，藤善真澄引傳文「高宗」，自己加註釋說：「高麗本作

〔一〕 蘇晉仁：續高僧傳，載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第四輯，知識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版，第一六四頁。

〔二〕 「日」藤善真澄：續高僧傳管見——以興聖寺本為中心（劉建英、韓昇譯），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一輯，中華書局，二〇〇五年版，第三二〇頁。

「玄宗」，應從三本。」即他在本文中交代的「宋、元、明三種版本」的大藏經續高僧傳。其實，在高麗藏之前，興聖寺唐抄本、趙城金藏此處文字都作「玄宗」。藤善真澄所以不依從高麗藏的「玄宗」行文，無疑認為「玄宗」是比唐高宗更晚的唐明皇的廟號。續高僧傳中，「玄宗」這一詞彙一共出現十五次，都不是指唐玄宗。「玄宗」的含義指玄妙高深的理論，它既可以是佛教，也可以是道教，也可以是別的學說。「玄宗」指佛教，如卷一九道林傳說：「隋開皇之始創啓玄宗，勅度七人。」「玄宗」指道教，辭源本條有說，並引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「眇眇玄宗」爲例。續高僧傳卷二五智實傳引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令道士在僧前詔說：「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，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。」這裏便是以「玄宗」、「真諦」對舉道教、佛教，指出世俗嘲笑道教、崇奉佛教的。藤善真澄引傳文「官宦」，趙城金藏、高麗藏本作「官臣」，礪砂藏本作「宮臣」，應從之，指太子東宮的臣僚。道宣另著集古今佛道論衡，在卷三中再次記載這場事，時間提前一年，行文有變化，云：「貞觀十二年，皇太子集諸宮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開明佛法。紀國寺慧淨法師預斯嘉會，有令召淨開法華經，奉旨登座，如常序胤。道士蔡晃講道論好，獨秀時英，下令遣與抗論。」綜合考慮，我認爲慧淨傳這段文字應這樣標點：

皇儲久餐德素，乃以貞觀十三年集諸宮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，延淨開闡法華。道士蔡晃講論道好，獨秀玄宗，下令遣與抗論。

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三和續高僧傳慧淨傳，都說蔡晃善於言辯，條理清晰。前者作「獨秀時英」，是說蔡晃在時賢中顯得特別優秀；後者作「獨秀玄宗」，便是說蔡晃在道士中顯得特別優秀，即本傳前文所說的

「道門之秀」。因此，傳文作「玄宗」是，作「高宗」非，當然不能理解爲唐高宗。再次，「下令」句子沒有直接主語，其邏輯主語是上文的「皇儲」，這符合唐朝制度。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一「尚書省」條說：「凡上之逮下，其制有六：一曰制，二曰敕，三曰冊，天子用之；四曰令，皇太子用之。」因此，這則傳文「是後人添加上去的」說法，根本不能成立。

那麼，道宣在初編完成後補入續寫的傳記文字而合成一編，這個最終成果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可以叫做「增補本」或者「修訂本」。這樣的話，總計正傳和附見人數，就不再是初編本的統計數字，據陳垣先生統計，「正傳凡四百八十五人，附見二百十九人」^[2]。

續高僧傳對於高僧傳的體例有因有革。高僧傳將立傳僧人分門別類，分爲十科，即：譯經、義解、神異、習禪、明律、亡身、誦經、興福、經師、唱導。續高僧傳保持了這樣的框架，做了局部調整。續高僧傳分爲十篇，把神異改名爲感通，把亡身改名爲遺身，把誦經改名爲讀誦，把經師、唱導合併爲雜科聲德，此外，增設了護法篇。正傳、附見中外籍僧人七百餘人，依據各自的傾向，分屬各篇，加上相關的世俗人士、道教人士，總數超過一千。這些不同身份、不同地位、不同認識的人，結成各式各樣的聯繫，必然將佛教引到信仰空間、行爲方式、政治領域、社會生活、思想戰線中。於是，通過續高僧傳的記載，我們不僅看到一個半世紀間佛教一方的發展情況，諸如翻譯佛典、闡發意蘊、創立學派、持律習禪、建造寺

[2] 陳垣：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二續高僧傳，中華書局，一九六二年版，第三〇頁。

塔、雕鑿石窟、製作經像以及中外之間的佛教傳播交流；而且看到社會一方的情況，諸如帝王、后妃、太子、諸王、公卿大臣、地方官僚同佛教聯繫的言行細節，朝廷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實施，僧人當面對帝王毀佛所施以的唇槍舌劍，佛教同道教的辯論、交鋒，僧人對某種人以道解佛或以佛解道所做的矯正，佛教對災變貧病的救助，甚至還看到四川地區道教極其普及和强大的人文地理現象，看到僧人的詩賦創作、書法成就、語言文字學功底，以及測量、建築、數學等方面的技能，如此等等，不必一一縷述。*續高僧傳*中的這些第一手記載，是別的書籍裏面沒有的，要想瞭解和研究這一時期的佛教史、道教史、思想史、學術史、翻譯史、美術史、建築史、文獻學、政治狀況、禮儀風俗、社會生活、中外文化交流、民族融合及同化，絕對離不開這部書。

*續高僧傳*流傳着兩個系統，一個是三十卷本，一個是三十一卷本。至於四十卷本，不過是三十一卷本的衍生物，即把有的卷拆分為上和下，例如明代的永樂北藏、清代的乾隆藏，有卷四上、卷四下等等，全書卷數總共四十，但最後一卷所標的卷次依然是卷三十一。有的版本如高僧傳二集，不分某卷上下，直接按照卷次順序編成流水號，標作四十卷，這不過是明清藏本的改頭換面而已。*續高僧傳*的版本很多，這裏不必悉數涉及，只從本書校勘標點的角度出發，選擇幾種重要的版本予以介紹。

國內刊刻的第一部大藏經，是北宋初年的開寶藏，又稱為蜀本藏。據南宋沙門志磐佛祖統紀卷四三記載，宋太祖開寶四年（九七一），「敕高僧張從信往益州雕大藏經板」；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（九八三），「成都先奉太祖敕造大藏經，板成進上」。但開寶藏早已散佚，無從窺見其原貌。

金代自金熙宗皇統九年（一一四九）至金世宗大定十二年（一一七二），歷時三十餘年，山西民間善男信女由女子崔法珍牽頭，募集資金，依據開寶藏的版式翻刻大藏經，同時補刻一些經疏，由解州（今山西解縣）天寧寺具體操辦。斗轉星移，這部大藏經遭受戰火和塵封，一九三六年才在山西趙城縣廣勝寺被人們發現，因而被稱爲趙城金藏。趙城金藏中有續高僧傳，屬於三十卷系統，但不是全本，只殘留卷二、三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一〇、一四、一六、一七、一九、二〇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九、三〇等，而且有的卷還有缺頁。

現存三十卷系統的完整本子，是鄰國高麗大藏經中的續高僧傳，也是依據開寶藏的版式翻刻的。高麗藏的初刻本從其國顯宗二年（一〇一）開工，於其國文宗末年（一〇八二）告成，其國宣宗七年（一〇九〇）又刊刻續編本。但在其國高宗十九年（一二三三）遭受蒙古兵的侵擾，其經板被燒毀。流傳至今的是高麗再雕本大藏經，從其國高宗二十三年（一二三六）至三十八年整體完成，是用開寶藏、契丹藏及本國初刻本、續編本參互校勘而雕刻的。其續高僧傳每卷的後面都雕刻一句話：「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。」

趙城金藏和高麗藏的續高僧傳同出一個系統，同是開寶藏的翻刻本，儘管如此，二者也有很多不同。首先，二者版式基本一致，但也有此本爲雙行小字、彼本爲單行大字者。如原卷二五（今據磧砂藏爲卷二六）道英傳，趙城金藏的傳文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吾與汝共爭我何者爲勝」、「遜公已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答曰此乃俗事心轉即是」，都是雙行小字，高麗藏的這些文字都是單行大字。其次，二

者字體基本一致，但高麗藏的「敬」字一律缺最後一筆。再次，二者同傳有不同的句子。如這篇道英傳，趙城金藏作「明相既現，口云捨卻」；高麗藏無「口云捨卻」四字。另如卷八慧遠傳，趙城金藏作「武帝不答此難，詭通後言」；高麗藏無「詭通後言」四字。復次，即便同一句子，二者常見不同用字，我在校勘記中有具體揭示。

三十一卷系統的完整本子，以磧砂大藏經中的續高僧傳爲代表。這部大藏經的刊刻地點，在南宋平江府治所（今江蘇吳縣）郊外陳湖磧砂洲中的延聖院，後來改名磧砂禪寺，因而有了磧砂藏的稱呼。磧砂藏始刻於宋寧宗嘉定九年（一二二六），綿延時日，南宋滅亡時尚未完成，伴隨着朝代鼎革的完成，鼙鼓聲漸漸消歇，到元成宗大德元年（一二九七）恢復刊刻，到元英宗至治二年（一三二二）才全部完成，歷時超過一個世紀。歷經戰亂，磧砂藏在國內逐漸散失，一九二四年才在陝西西安被發現，一九三〇年被確定爲磧砂藏，一九三五年首次由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印行問世。但這是後來的事，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，開國之初即刊刻洪武南藏，就是以磧砂藏爲底本而略有擴充的。明代後來還有永樂南藏、永樂北藏，清代有乾隆藏，三十一卷本磧砂藏續高僧傳就這樣一脈相承延續下來。但明清藏本也有同磧砂藏本不一樣的地方，比如卷二七感通篇中的目錄和傳文，僧傳順序有所不同。明清藏本的用字更爲規範，磧砂藏本作「加坐」，明清藏本基本上都作「跏坐」，磧砂藏本作「鍾」，明清藏本則區分爲

〔二〕于友先：影印磧砂大藏經序言，磧砂大藏經第一冊，線裝書局，二〇〇五年版，第二頁。

「鍾」和「鐘」，等等。

三十一卷本系統的續高僧傳，同三十卷本系統的相比較，正傳多出七十一人，附傳多出七人，這自是二者明顯不同的地方。磧砂藏本卷二一，整卷內容為三十卷本系統所沒有，在卷末有交代文本來歷的文字，說：「右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，見內典錄，保唐寺藏經。」據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，會昌六年（八四六）五月，長安平康坊「菩提寺改為保唐寺」。可推測唐宣宗在唐武宗毀佛運動之後復興佛教，保唐寺搜集到幸免銷毀的藏經，其中有三十一卷本續高僧傳。可見三十一卷本由來已久，人們已注意到它與三十卷本的不同之處。另一方面，即使兩個系統同一篇傳記，其不同處也比比皆是。有的傳記，句子或有或無，卷一六法聰傳，三十一卷本比三十卷本多出三百八十個字。至於同一句子中的用字，其不同處幾乎每篇都有。

清末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到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，上海頻伽精舍以日本明治十二年（一八八〇）至十八年的鉛字排印本弘教書院大藏經為底本，出版了鉛字排印本頻伽精舍大藏經，其中收錄續高僧傳。從日本大正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到昭和九年（一九三四），日本出版了鉛字排印本大正新修大藏經，其中收錄續高僧傳。這時，趙城金藏和磧砂藏的完整本子還沒有發現和公佈，頻伽藏、大正藏整理的續高僧傳，以三十卷系統的高麗藏本為母本，維持其框架結構，將由三十一卷系統而來的四十卷本續高僧傳多出的傳記，附在高麗藏本同類僧傳的後面。這也算是個辦法，但在標注卷次方面卻顯得不倫不類。比如頻伽藏、大正藏本續高僧傳，其卷二〇為習禪五，接着穿插進來四十卷本的卷二五習禪六、卷二六習

禪六之餘，下面卻是自己的卷二一明律上，而頻伽藏、大正藏本續高僧傳自己就有卷二五感通上、卷二六感通下。如果引用書中資料，交代出處是卷二五、卷二六，到底是本書自己的卷二五、卷二六，還是插進來的卷二五、卷二六？這是比較混亂的事情。

一九七八年，日本發現了圓通山興聖寺唐代抄本續高僧傳，是三十卷本，有殘損段落，但基本完整。我加以對照統計，發現興聖寺本比高麗藏本少二十九篇傳，比磧砂藏本少九十八篇傳，具體情況，已寫入相關傳記的校勘記中。前面說過，據陳垣先生統計，磧砂藏本「正傳凡四百八十五人，附見二百十九人」。而興聖寺本，據藤善真澄上揭文的說法，只有「本傳三九〇人和附傳一五一人」。興聖寺本是續高僧傳初稿之後的一個早期升級本，因而不但傳文比後來的本子少了很多篇，而且像玄奘傳，也只寫到他回國初期的活動，後來十多年的活動，在成型後的本子中才有記敘。興聖寺本畢竟是一个抄本，同正式進入刊刻程序的本子相比，顯得十分粗糙，錯別字、脫文、衍文、一字拆分爲二字等等現象，充斥在每篇傳文和論曰中。但披沙揀金，竟然也有糾正各本錯誤的資料，這在我的校勘記中有具體交代。

衆多版本的續高僧傳，各有正誤，各有優劣，因此，任何一種版本都不可以單獨憑據。而且，諸本存在很多相同的錯誤，特別表現在地理、人名、爵位方面，僅僅局限於不同版本的續高僧傳去做校勘，是無法糾正這些錯誤的，只能依據其它書籍。現在看來，以磧砂藏三十一卷本爲底本，依據其結構、順序，去做校勘工作，比以高麗藏三十卷本爲結構、順序，强行削足適履，要合理得多，順暢得多。本書的校勘標點，便是按照這個思路進行的。凡是磧砂藏本和興聖寺抄本、趙城金藏殘本、高麗藏全本共同有的內